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邢義田 黃寬重 鄧小南 總主編

陳國棟 羅彤華 主編

經濟脈動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經濟脈動

陳國棟 羅彤華 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總編輯：徐惟誠

社 長：田勝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濟脈動/陳國棟,羅彤華主編.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 4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6/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ISBN 7 - 5000 - 7306 - 2

I. 經... II. ①陳... ②羅... III. 經濟史—中國—古代—文集
IV. F129. 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39419 號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阜成門北大街 17 號 郵政編碼:100037 電話:010 - 68315609)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市智力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635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張:26.5 字數:42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5000 冊

ISBN 7 - 5000 - 7306 - 2/K · 457

定價:45.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與出版社聯系調換。

主編簡介

陳國棟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職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現任職歷史語言研究所。著有專書 *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 1760 ~ 1843*。論文有《清代前期廈門的海上貿易》、《經濟發展、奢侈風氣與傳統手工藝的發展——以明代為中心的例證》等。曾任教於臺灣大學經濟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等處。研究重點為明清經濟史、中國海外貿易史。

羅彤華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專研社會經濟史，兼及敦煌吐魯番學與法制史，時代範圍由秦漢轉至隋唐五代，近年之研究課題包括民間借貸、官方放貸、國家財政以及家庭問題，發表論文約三十篇，有《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漢代的流民問題》等專著，近期將出版博士論文《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

《制度與國家》

《政治與權力》

《思想與學術》

《社會變遷》

《經濟脈動》

《城市與鄉村》

《家族與社會》

《婦女與社會》

《生活與文化》

《禮俗與宗教》

《生命與醫療》

《美術與考古》(上、下)

策劃編輯：楊曉燕

責任編輯：翦 宴
梁運華

封面設計：王宜梁

責任印製：徐繼康

出版說明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是數十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史領域代表性著述的匯編。叢書共分十三個專題，多角度多層面地反映海峽對岸中國史學的豐碩成果，如此大規模推介，在大陸尚屬首次。

叢書充分尊重臺灣學者的觀點、表達習慣和文字用法，凡不引起歧義之處，都儘可能遵照原稿。作者觀點與大陸主流觀點不同之處，請讀者審別。由於出版年代、刊物、背景不同，各篇論文體例不盡相同，所以本叢書在格式上未強求統一，以保持原作最初發表時的風貌。各篇論文之后都附有該論文的原刊信息和作者小傳，以便讀者檢索。

在用字方面，既尊重原作者的用法，又充分考慮到海峽兩岸不同的用字和用詞習慣，對原稿用字不一致的情況進行了一些處理。

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指正。

論叢編委會

2005年3月

總序

邢義田

爲了增進海峽兩岸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相互認識，我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支持下，從過去五十年臺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論文選出一百七十八篇，約五百三十萬言，輯成《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十三冊。

十三冊的子題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這些子題雖不能涵蓋臺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各方面，主體應已在內，趨勢大致可現。

這十三冊分由研究領域較爲相近的青壯學者一或二人擔任主編，負責挑選論文和撰寫分冊導言。選文的一個原則是只收臺灣學者的或在臺灣出版的。由於是分別挑選，曾有少數作者的論文篇數較多或被重複收入。爲了容納更多學者的論文，主編們協議全套書中，一人之作以不超過四篇、同一冊不超過一篇爲原則。限於篇幅，又有不少佳作因爲過長，被迫抽出。這是選集的無奈。另一個選錄原則是以前期出版者爲主，以便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不過，稍一翻閱，不難發現，各冊情況不一。有些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餘年的論文，有些則有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這正好反映了臺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轉移。

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臺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其次則在介紹各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不過，導言的寫法沒有硬性規定，寫出來各有千秋。有些偏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於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自己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爲主軸。最後我們決定不作統一，以保持導言的特色。這樣或許有助於大家認識臺灣史學工作者的多樣風貌吧。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所收論文早晚相差半世紀，體例各有不同。我們不作統一，以維持原貌。有些作者已經過世，無從改訂。多數作者仍然健在，他們或未修改，或利用這次再刊的機會，作了增刪修訂。不論如何，各文之後附記原刊數據，以利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各自發展的。大陸的情況無須多說。^[1] 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早期是由一批 1949 年前後來臺的文史和考古學者帶進臺灣的學術園地如臺灣大學、師範大學（原稱師範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2] 從 1949 到 1987 年解除戒嚴，臺灣學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和單位，有將近四十年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猶記在大學和研究所讀書時，不少重要的著作，即使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版的，都以油印或傳抄的方式在地下流傳。出版社也必須更動書名，改換作者名號，刪除刺眼的字句，才能出版這些著作。在如此隔絕的環境下，臺灣史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走在馬克思理論之外。

臺灣史學另一大特色則是追隨一波波歐美流行的理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對中國史發展較具理論或體系性的說法。記得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師長要我們讀鄧之誠、柳詒徵、張蔭麟或錢穆的通史。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學裏仍有不少教師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當教本。^[3] 中國通史之作不是沒有，能取而代之的竟然少之又少。說好聽一點，是歷史研究和著作趨向專精，合乎學術細密分工和專業化的世界潮流；說難聽點，是瑣細化，少有人致力於貫通、綜合和整體解釋，忽略了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和精神。

這一趨向有內外多方面的原因。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學者之中，並不缺融會古今、兼涉中外的通人。然而初來臺灣，生活艱

[1] 可參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79年；張玉法《臺海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1949～1994）》，《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8（1994），頁47～76。

[2]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臺灣唯一一所高等學府是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收復後，日籍研究人員離臺，仍在臺大的教員有楊雲萍、曹永和、徐先堯等少數人。但他們的研究此後並沒有成為主導的力量。請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年，頁3。

[3] 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頁6。

困，爲了衣食，絕大部分學者無法安心治學著述。加上形格勢禁，爲求免禍，或噤而不言，不立文字；或退守象牙之塔，餽釘補注；或遠走海外，論學異邦。這一階段臺灣百廢待舉，學校圖書普遍缺乏，和外界也少聯繫。新生的一代同樣爲生活所苦，或兼差，或家教，能專心學業者不多。唯有少數佼佼者，因緣際會，得赴異國深造；七八十年代以後陸續回臺，引領風騷，才開展出一片新的局面。

除了外部的因素，一個史學內部的原因是早期來臺的學者有感於過去濫套理論和綜論大勢的流弊，多認爲在綜論大局之前，應更審慎地深入史料，作歷史事件、個人、區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窄而深的研究，爲建立理論立下更爲穩固的史實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陶希聖經歷所謂社會史論戰之後，即深感徒言理論之無益，毅然創辦《食貨》月刊，召集同志，爬梳史料。本於同樣的宗旨，1971年《食貨》在臺灣恢復出刊，成爲臺灣史學論著發表的重要陣地。來臺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也一直以史料工作爲重心。

這一走向其實正和歐美史學界的趨勢相呼應。二十世紀之初，除了馬克思，另有史賓格勒、湯恩比等大師先後綜論世界歷史和文明的發展。此一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退去，歷史研究趨向講求實證經驗，深窄專精。以檔案分析見長的德國蘭克(L. V. Ranke)史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成爲臺灣史學的一個主要典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整理出版了《明實錄》和部分明清檔案，後者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領下，自1957年起整理出版了《海防檔》、《中俄關係史料》、《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文件》等一系列的史料；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則有學者致力於琉球實案和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基於以上和其他不及細說的內外因素，臺灣的歷史學者除了錢穆等極少數，很少對中國史作全盤性的宏觀綜論。^[4]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臺灣史學發展的關鍵年代。外在環境雖然荊棘滿佈，但已脫離初期的兵荒馬亂。經濟快速起飛，學校增加，設備改善，對外交流日益暢通，新的刺激源源而入。以臺大爲例，

[4] 參張玉法，前引文，頁76。

七十年代初，研究圖書館啓用，教師和研究生可自由進入書庫，複印機隨後開始使用，大大增加了隨意翻書的樂趣和免抄書的方便。六七十年代在中外不同基金會的資助下，也不斷有中外學者來校講學。猶記大學時聽社會學家黃文山教授講文化學體系。他曾應人類學巨子克魯伯（A. L. Kroeber）之邀，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學人，也曾翻譯社會學名家素羅金（P. A. 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今日社會學學說》和李約瑟（J. 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技術史》等名著。聲名如雷，聽者滿坑滿谷。研究所時，則聽以寫《征服者與統治者：中古中國的社會勢力》（*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柏哈（Wolfram Eberhard）講中國社會史。

除了正式的課程，校園內演講極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言論的尺度稍見放寬，一些勇於挑戰現實和學術的言論、書籍和雜誌紛紛在校園內外，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出籠。以介紹社會科學爲主的《思與言》雜誌自1963年創刊，曾在校園內造成風潮。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幾乎成爲歷史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儘管大家不一定能會通消化。走出充滿科學主義色彩的教室，於椰子樹下，月光之中，大家不是爭論沙特、老、莊，就是膜拜寒山、拾得。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普普藝術和野獸派，風靡一時，無數的心靈爲之擺蕩在五光十色的思潮之間。屢禁屢出的《文星》雜誌更帶給青年學子難以言喻的刺激和解放。以個人經驗而言，其衝擊恐不下於孫中山出洋，見到滄海之闊、輪舟之奇。臺灣內外的形勢也影響著這時的校園。“文化大革命”、反越戰、萌芽中的婦女解放和政治反對運動，曾使校園內躁動不安，充滿虛無、飄蕩和萬流競奔的景象。

這一階段臺灣史學研究的主流風氣，除了延續史料整理的傳統，無疑是以利用社會科學、行爲科學的方法治史，或以所謂的科際整合爲特色。在研究的主題上有從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轉向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趨勢。這和1967年開始許倬雲主持臺大歷史系，舉辦社會經濟史研討會，推動相關研究；陶希聖之子陶晉生在臺大歷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實習，支持食貨討論會，有密切的關係。1978年張玉法出版《歷史學的新領域》，1981年康樂、黃進興合編《歷史學與

社會科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尋找新理論、探索新方向努力的象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和法國年鉴學派的理論大為流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不但反省了史學的趨勢，也介紹了年鉴學派、心態史學和其他新的史學理論。從1984年起，康樂主持新橋譯叢，邀集同志，有系統地翻譯韋伯、年鉴學派和其他歐美史學名著。這一工作至今仍在進行。約略同時，一批批在歐美教書的學者和留學歐美的後進，紛紛回臺，掀起一波波結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風潮。1988年《食貨》與《史學評論》先後停刊，1990年《新史學》繼之創刊。1992年黃進興出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3年周櫟楷出版《歷史學的思維》，2000年古偉瀛、王晴佳出版《後現代與歷史學》。臺灣史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題材從此進入更為多元、多彩多姿的戰國時代。仔細的讀者當能從這套書的不同分冊窺見變化的痕跡。^[5]

曾影響臺灣中國史研究甚巨的許倬雲教授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裏說：“回顧五十年來臺灣歷史學門的發展軌跡，我在衰暮之年，能看到今天的滿園春色，終究是一件快事。”^[6]在2005年來臨的前夕，我們懷著同樣的心情，願意將滿園關不住的春色，獻給海峽對岸的讀者。

2004年12月

[5] 請參本叢書《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彭明輝所寫《導論：方法、方法論與歷史解釋》；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

[6] 許倬雲《錦瑟無端五十弦——憶臺灣半世紀的史學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頁14。

導 言

羅彤華 陳國棟

就臺灣的中國經濟史這個範疇而言，研究宋、元以下的學者較多，也比較具特色，不過，隋唐以前的探索，臺灣的經濟史學者也不曾缺席。整體而言，五十年來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果。我們在選錄文章時，限於個人學養，耳目不周，掛一漏萬，滄海遺珠，在所難免，萬請讀者海涵。

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們檢視了臺灣地區過去五十年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的業績，並且在此簡單地加以介紹。前面一半導論，由羅彤華主稿，後面一半由陳國棟撰寫，大致從宋、元時期斷開。內容各分成兩部分：一方面對整體研究狀況作一鳥瞰，另一方面則對收錄在本集中的作者及作品稍作描述。讀者細繹各文、參考其注解出處，當可窺測五十餘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上鍥而不捨的努力與求新求變的精神。

相對於研究宋代以後的學者稍具規模，臺灣學術界在隋唐以前的研究上，顯然面對著兩個困境：一是對內無法形成龐大的學術社群，二是對外難以受到國外學術界的關注。就前者而言，臺灣雖然不乏極有成就的大師級人物，但或常住國外，或鮮少指導學生，所以頗難帶動相關領域的研究風潮，使隋、唐以前經濟史的研究呈現散兵游勇、各自為政的情況，彼此間因缺乏對話機會與相互激蕩，不易擴大學術社群，難以吸引有志者參與。再就後者而言，由於臺灣對這個時期的研究數量少，而且議題零散，再加上與外界的交流不夠，海外地區對本地的學術資訊認識也不足，即使某些領域的研究品質相當高，卻仍未受到國外學界應有的重視。在此謹擇要介紹部分的研究成果如後：

1950年代以來，臺灣研究先秦兩漢經濟史的主題，大致環繞於土地與農業方面。在西周土地制度與秦漢土地兼併問題方面，勞幹、管東貴、韓復智、侯家駒、葉達雄等人都做過專門研究，但自1990

年代以後，這股研究風氣已見式微。關於古代經濟史，臺灣學者在農業技術方面選取了獨特的議題，並提出具突破性的論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倬雲與陳良佐兩位先生。許倬雲討論自西周至漢代的農業技術，以及農業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係，認為漢代農業朝向精耕細作方向進展，並引導出層級不同的貿易網。陳良佐在春秋至兩漢間的氣候變遷、古代的農田施肥問題，以及古代農具的使用與演變方面，都有系列研究，為中國古代農業技術研究的推進做出重要貢獻。

近五十餘年來，臺灣在中古經濟史方面的研究風氣不是很興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議題與成果，尤似點綴般地出現，僅劉淑芬在商業貿易、區域經濟與城市經濟方面有較引人注目的論述。隋唐時期雖然研究方向相對具多元性，文章篇數也遠較魏晉南北朝時期為多，但真正能結合敦煌吐魯番文書來論證者，不過一二人而已，也因此臺灣大學高明士教授邀請兩岸三地學者編成《隋唐文化研究叢書》時，經濟方面就由韓國磐、陳國燦、張澤咸三位大陸學者負責，顯示臺灣的隋唐經濟史研究不免有其局限。

隋唐經濟史議題中，臺灣方面成就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是嚴耕望的交通史研究。嚴氏主要在考索唐代各交通線，但追溯源流常及於上古秦漢時代，其大作《唐代交通圖考》原本預定出版十卷，不幸只出到第六卷，先生即已辭世。該書體大思精，論證綿密，對於交通動線沿途所經州府軍鎮、館驛津梁、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古跡詩篇等，皆綱舉目張，史料備盡，並輔以地圖說明，是治中古史者不得不參考的重要典籍。近年注意歷史地理之研究者還有廖幼華，對嶺南交通與河北水道都曾投注心力。

在國家財政方面，是隋唐經濟史議題中另外一個比較有成果的部分。盧建榮在1980年代前期對財政決策人物與措施有系列討論。羅彤華則自1990年代末起，於官本放貸與和糴問題有專門研究，探討政府如何運用預算外收入及調度糧穀的措施，來填補財政空缺。

在人民的經濟生活上，臺灣學者的研究有幾個重點可予介紹，就農業與土地制度來說，值得注意的如：侯家駒在農民耕作力與畝產量上批判谷霽光、李伯重的說法。吳章銓對農民問題有專著。黃耀能研究自上古至隋唐的農田水利事業。林天蔚、羅彤華利用出土

文書探討均田制及租佃制。在商貿與物價方面，章群、莊申都處理過絹馬貿易。趙岡根據一份吐魯番出土的物價資料，推斷棉花在當地的商品性質。至於百姓的實際生活，羅彤華從借貸的角度，論析質借制度、利率、債務擔保等問題。

臺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宋代以後的情形較隋唐以前蓬勃許多。在臺灣大學王德毅教授與文化大學宋晞教授的引領下，培育了不少宋代經濟史的人才，研究成果也稱豐碩。在國家財稅方面，宋代政府飽受財政壓力，王德毅、梁庚堯分別探究國計難題、歲幣與軍糧問題。為了解決國家重負，政府實施各類賦稅以維持開支，宋晞、王德毅、方豪、趙雅書等，各就田賦、商稅、雜稅等闡述制度特色與運作實況。人力也是國家資源，臺灣學者對宋代役法的討論也相當深入，宋晞、王德毅與青年學者黃繁光都對此做了闡釋。專賣制度有利於平衡財政收支，其中以鹽的專賣最引人注目，梁庚堯在這方面深有成就，他全面性地探索私鹽問題和官鹽各產區的生產、運銷制度及對財政的影響。此外，朱重聖在茶的專賣上也頗有心得。

歷經唐、宋變革後，宋代無論農業或工商業都有顯著的發展，臺灣學者在各議題上的表現其實很突出。在農業與土地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庚堯的研究，梁氏有兩本專著與多篇論文，分別處理南宋的農地利用與農村經濟問題，以及各地區的農業發展狀況。手工業是促進商品流通的條件，趙雅書特別在絲織業研究方面卓有成果，他討論絲織業的分佈情形，及其經營方式與技術。至於官府工場組織與工匠來源，可參考韓桂華的論述。在商業貿易方面，臺灣學者的成就也相當亮眼。關於商業中心、商人政策與商業活動，宋晞有一連串的研究。梁庚堯則頗為注意政府與商業、商人的關係。宋代的對外貿易活絡，研究者相當不少，宋晞尤其在宋與高麗的貿易上著力甚深。在交通運輸方面，韓桂華注意宋代的綱運。此外，宋代海上交通發達，泉州具備良好的發展條件，方豪、李東華都曾以泉州為研究核心。

臺灣的歷史研究社群不能說太小，但是也不大。學者們關心的議題，古今中外都有，人力分散，各自為政，過去五十餘年間，並沒有形成特別的共同主題或所謂的“學派”。個別的領域從業人口不多，自創學說或方法的情況也不大常見。不過，臺灣擁有相對較為

開放的社會條件，歐美、日本的研究可獲得，而大陸學者的作品也不乏有參考的機會。大陸與日本對各個斷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皆有一定的影響，歐、美學術則在有意無意間為本地的明、清、近代經濟史研究的動向注入新的激素。

就五十年來，臺灣地區有關明、清以來中國經濟史之研究而言，早期全漢昇先生對這個行道的貢獻最大，研究的議題廣泛。王業鍵先生是他最為知名的弟子，主要的研究以清代的物價為主。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費景漢先生與劉翠溶女士也大力提倡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全漢昇、費景漢、王業鍵與劉翠溶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俱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影響力自然不小。他們幾位的主要研究，反應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前的一項主流——“歷史計量學”（cliometrics）的受重視。

話說回來，在當時，“歷史計量學”這個術語並沒有廣泛流通；真正風行的做法是對數字證據與數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的偏好。本來經濟史就是一門重視“度量”（measurement）的學問，一如英國著名的經濟史學者克拉判（John H. Clapham）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提出的名言：“經濟史在方法論上的獨特性，基本上是依這門學問對數量的興趣而轉移”的。到五十年代以後，因為“經濟計量學”（econometrics）的發達，促使經濟史的發展也朝同一個角度轉向。不過，原始的歷史數據品質並不一致，要使用史料中的數字，必須經過繁複的檢證與分析；在沒有直接數字可用時，還得從事細密的爬梳與計算。王業鍵與劉翠溶在這方面致力最深。王業鍵有關中國雨雪糧價的研究，開始於三十餘年之前，到目前為止仍然鏗而不捨；劉翠溶的人口史研究，以1992年的專書《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作一個終結，轉向致力於環境史的研究。

除了對數據與計量方法的重視以外，九十年代以前，臺灣的經濟史研究也多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成長理論”的影響。戰後一些新興的國家與地區迅速地走向工業化，對於經濟的進步與人類福祉的提升充滿信心。這種看法，也影響到明、清與近代經濟史的研究，預設了某種“進步”的必然性，試圖在研究過程中找尋中國經濟史中所展現的發展實況與阻滯發展的因素。這樣的一個研

究取徑，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大陸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影響。

然而戰後世界上衆多地區從事經濟發展的結果，使得資源過度被開發利用，造成對地球環境的嚴重負面衝擊。八十年代以後，環境主義興起，使得經濟史家也不能漠視人類在經濟進步的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環境史成爲新的研究時尚。劉翠溶院士與澳洲國立大學的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共同主編的《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可謂開啓臺灣研究環境史的先聲，九十年代中期以後，許多大學研究生也拿環境史當課題。

九十年代以後，還有一項理論與做法影響到臺灣的經濟史研究，那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諾斯（Douglas North）所建構的制度經濟學理論，特別是有關“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這類的概念，就被大量地加以介紹、討論與運用。這些理論，配合九十年代以前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所引介的“中地理論”、“行銷系統”、“經濟區域”等主張，也都讓臺灣的經濟史從業者在有關市場、商路、商業活動等的研究上，獲得一些別開生面的刺激。

晚近以來，在臺灣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脫離重視數據與數量化的趨勢，轉而向環境史或社會、文化史靠攏。

轉向環境史的研究是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新出路，可是到目前爲止，成績仍然有限。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中國文獻不但不能提供有效的數據，甚至連可供詮釋用的純文字描述也不多。環境變遷在工業化之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單憑一個當代識字者的直接觀察很難看出什麼。中國史料關心的通常是災難（書上叫做“祥異”），而不是環境。結果，研究者只能重複原來傳統經濟史的資料，將經濟變遷直接說成是環境變遷。

另一批原來對經濟史有興趣的人，轉而向社會、文化史靠攏，特別是強調所謂“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重視歷史文物或遺跡（relics）的分析，從而推斷某一個時代人群的生活內容及其變遷。“物質文化”的分析原本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的專業領域，此時給了歷史學家新的靈感與新的出路。當然，這一次的轉向也不是臺灣學者的創獲，與每一個階段的轉向相同，還是從境外沿

襲而來。直接提供借鑒的，或許是法國學者布勞岱耳（Fernand Braudel）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部曲等書吧。法國的“年鉴學派”（the *Anal* school）在臺灣擁有相當數量的讀者，不過，比較直接的，還是透過美國的學術界將物質文化的研究帶到經濟史的研究，而在臺灣產生一些追隨者。物質文化的研究介入原有的傳統社會經濟史研究，以社會文化史的姿態蔚為臺灣歷史研究的一股勢力，有些原來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學者也被吸引過來。這種研究比較適合一般歷史學家的口味，但也離傳統的經濟史研究越來越遠。

臺灣的中國明清、近代經濟史研究的轉向，主要的原因可說是“能事已竭”（exhaustion of possibility）與技術瓶頸兩大因素。

所謂的“能事已竭”指的是可開發、重建的統計值（statistics）素材越來越少。前此，本地和世界各地的學者已在人口、物價、貿易統計數字、生產力評估、聚落數量……方面取得豐碩的成果，新的材料及新的議題都不容易獲得，不得不改弦易轍。

所謂“技術瓶頸”則很容易明白。數十年來，臺灣的經濟學界極少培養出以經濟史為專業的學生，大學開設經濟史課程，除少數例外，都由有歷史學背景的教師來擔任。一般經濟史的學術活動，參加者幾乎也是清一色的歷史學家。歷史學家的專業技能是搜集、考證及綜合分析他的材料。雖然他們強調“輔助學科”，也會研讀一些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文獻，但非科班出身，通常無法圓熟地掌握相關理論及分析工具（如數學、統計學……之類）。當重建數據和數據系列的困難度越來越嚴重，還有有關經濟現象的描述越來越以統計值的方式呈現時，有歷史學背景的經濟史學家也就越來越只能袖手旁觀、望洋興嘆了。

末了，我們還得說臺灣地區的經濟思想史研究作得不够。經濟史的研究原本也應注意歷史上人們對經濟問題的思考，也就是說經濟思想史也應該有人加以研究。不過，過去五十餘年間，臺灣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遜色，只有零星的少數作品而已。

整體說來，臺灣的明、清與近代經濟史研究雖然沒有產生重大的理論，但是曾經加入此一主題的研究者先後也有數十人以上，而個別的研究成果為數也不算少，說得上是粲然可觀。限於篇幅，我